



简报系列

序列号：BR20071101CH 总第 7 期

理智处理来自中美贸易争端的威胁

【前言】：中美贸易失衡不断扩大早已引起华盛顿的广泛关注。日益高涨的美国贸易保护主义认为巨大的贸易逆差降低了美国工人平均工资，造成美国失业率上升，损害了美国国民福利。为阻止中美贸易失衡进一步扩大，美国近年来不仅在 WTO 框架内频繁提起对中国的各种起诉，甚至有部分政界人士控告中国政府操纵人民币汇率并倡议对中国进行贸易制裁。另一方面，面对来自美国的巨大压力，中国为维护自身利益也极力自我辩护，将中美贸易失衡的主要责任推向美国，认为美国国民储蓄率长期处于较低水平及美国政府的巨大预算赤字是导致目前中美贸易严重失衡的主要原因。面对两国贸易日益失衡的现实和两国贸易争端日渐扩大的现状，两国究竟应该如何从双赢角度出发理智处理来自中美贸易争端的威胁？应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的邀请，美国布鲁金斯学会资深研究员胡永泰教授从生活中的例子切入话题，深入浅出地向公众阐述了其相关学术成果。

讲座主题：理智处理来自中美贸易争端的威胁——从日益增强的全球经济相互依赖性和不断加速的技术创新视角的分析

主办单位：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

时间、地点：2007 年 11 月 1 日；中国北京，清华大学

主持人：肖耿，清华 - 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主讲人：胡永泰，美国布鲁金斯学会资深研究员



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
BROOKINGS-TSINGHUA CENTER FOR PUBLIC POLICY



BRIEFINGS

SN : BR20071101CH VOLUME 7

Dealing Sensibly with the Threat of Disruption in Trade with China: The Analytics of Increased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Preface】 :The increasing imbalance between US-China trade has intrigued broad attention from Washington Administration. In view of the powerful protectionists the huge trade deficit leads to lower average wages of American workers, and higher unemployment rate, thus a threat for the welfare of US people. To prevent deepening US-China trade imbalance, US sued Chinese companies frequently in recent years under the framework of WTO, and even some politicians charged Chinese government of manipulating RMB exchange rate and proposed to execute trade sanctions toward China. On the other hand, facing the great pressure from US, China also defenses for her interests, and attributes the main responsibility of trade imbalance to US' low savings rate and massive budget deficit. Confronting the reality of growing trade disputes, how can the two countries deal sensibly with the threat of disruption? Brookings Tsinghua Center invited Wing Thyee Woo, senior fellow in Brookings Institution, to expound his related academic research and he explained the profound reasoning in a simple way by making analogues using examples in daily life.

TOPIC: The Current State of China's Macro Economy and Capital Markets

ORGANIZER: Brookings-Tsinghua Center for Public Policy

TIME & PLACE: November 1, 2007;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China

MODERATOR:

Xiao Geng, Director, Brookings-Tsinghua Center for Public Policy

SPEAKERS:

**Wing Thye Woo, Senior Fellow, Global Economy and Development/Foreign Policy
Studies/John L. Thornton China Center, Brookings Institution**

不断增长的巨大的美中贸易不平衡在华盛顿受到了广泛关注。有观点认为巨大贸易赤字损害了美国的福利，增加了失业并且降低了工资。这些观点能否得到数据的检验？美国贸易逆差的根源是什么？美国究竟应当如何解决贸易逆差？如何处理在解决贸易逆差过程中与中国的关系？胡永泰教授用生活中的例子解释切入话题，深入浅出地向公众传达了其严肃的学术成果。

一、世界各国对自由贸易的态度发生转变

Pew 研究中心(The Pew Research Center)于 2003 年和 2007 年分别在 38 个国家调查“你是否认为贸易对经济发展起积极作用”，结果表明，2003 年，美国约有 78% 的人持肯定回答，但 2007 年，只有 59% 的人持肯定回答，美国人对贸易支持度不断下降。这种现象并不局限于美国，而是在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上述 38 个国家中有 27 个国家对贸易的支持率下降，仅有 9 个国家对贸易的支持率上升，另有两个国家的支持率保持不变。

假设我们忽略支持率小于 5% 的变化，即只计入超过 5% 的支持率变化，则共有 13 个国家对贸易的支持率大幅度下降，包括七国集团中的美国、意大利、法国、英国和德国，作为世界贸易体系的核心成员，这些国家越来越不支持贸易。另外，共有 4 个国家对贸易的支持率大幅度上升，这四个国家则都不属于世界贸易体系中的重要成员。另外，最初反对世界贸易的国家，如阿根廷、约旦、印度等逐渐改变态度。中国则从 1978 年开始认识到了贸易对中国的好处。

这个事实意味着对世界贸易发挥了巨大作用的国家和人民，不再支持贸易的发展，转而反对贸易。美国对自由贸易态度的转变尤其具有典型性，它不仅充分体现了其他国家的转变，而且表现得更为彻底。种种迹象表明，美国对于多边自由贸易体系的支持已经减弱。美国官方立场一向支持多边自由贸易的，而不支持和单独的国家缔结自由贸易协定，加拿大、墨西哥作为其最邻近的盟友是唯一的例外。如今，美国却跨过太平洋和韩国缔结了自由贸易协定。2007 年，美国已经向 WTO 提出四项针对中国的申诉，四个参议员提出法案指责中国进行汇率的操纵，建议对中国进行贸易制裁。美国下一届的总统很有可能是民主党人，而该党两个最有希望获胜的候选人，作为法案的共同倡导者，都表示他们将会签署这个法案。

美国一向是 WTO 最坚定的支持者，现在却在支持自由贸易方面犹豫不决，原因很多。首先，自由贸易导致国内工人的焦虑情绪。其次，美国向韩国、日本、台湾及东南亚国家开放市场是基于冷战时期的盟友关系。冷战的历史已经结束，美国需要重新考虑是否继续

执行这种政策。再次，最支持 WTO 的最有组织、最有游说力量的团体——经济学家改变了观点。过去，经济学家认为自由贸易对任何一个国家都有益。萨缪尔森也曾经建立过相关经济模型支持该观点。而在两年前，萨缪尔森改变了观点，他认为自由贸易对发展中国家有好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对于发达国家并没有好处。从那以后，许多美国经济学家开始倡导自由贸易对于美国并没有好处。

王海峰认为，可以从几个角度来评价自由贸易。从国家的层面来讲，是穷国还是富国受益更多？从 2000 年到 2007 年从 GDP 增长的角度而言中国最大的受益者。从企业的层面来讲，是大企业受益，还是小企业受益？这个尚无确切结论。但可以肯定，跨国企业是最大受益者，在全球投资报告中，跨国企业前一百家没有一家掉出百名之后。从受益的角度来讲，是穷人受益还是富人受益？穷人受益的幅度要比富人小得多。

二、全球化与技术创新对美国的影响

在世界各国对自由贸易的态度发生转变的过程中，中美之间也不断发生贸易争端。胡永泰认为，中美双方出现争端或争议时，导致双方关系出现矛盾，态势紧张时，各方面都容易把责任归结为对方。近来，美国反对贸易的态度日益明显，虽然一方面是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加剧紧张的局势，但一方面是由于其国内因素如劳动者频繁更换工作等。

1. 经济全球化导致美国对全球贸易逆差

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过去 20 年时间里最重大的一件事情，是原来属于中央计划经济的国家及占全世界 50% 的人口进入国际分工体系。他们从原先本国的独立经济体系，融入世界经济体系。1990 年，全世界 23 亿工人中只有 10.8 亿人完全参与国际贸易体系，其余工人则是在有限的程度上加入国际贸易体系。中国从 1992 年开始加入国际贸易体系，并承诺成为市场经济国家，在有限度加入世贸体系的情况下，这也给中国带来了很大的收益。印度看到中国 1978 年以来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功，决定于 1991 年 12 月加入世界经济体系。此外，前苏联、波兰、还有中东欧地区的国家及其工人也不断加入了国际贸易体系。2001 年，国际贸易体系中的劳动力数量翻了一番。

根据国际贸易模型，如赫克歇尔-俄林模型，国际贸易体系中的劳动力数量翻番会导致工资下降，失业率上升。根据该理论，美国与中国等国的贸易逆差过大导致美国工人工资下降、失业率上升，陷入艰难的境地。因此，许多美国人呼吁人民币远期升值 40%，即期升值 25% 以减少贸易逆差。

但令人吃惊的是，这些经济理论的预测并不能用数字证实。美国贸易余额占 GDP 的比重一直稳步下降。假设 1983 年的 GDP 为 100，之后美国的贸易余额由正变负，1998 年以来发生大幅度下降。同期，美国全职工人的平均薪酬稳步上升，失业率较 1983 年稍有改

善，但仍保持非常低的水平，整体较平稳，皆与模型预测相悖。在中美贸易冲突中备受关注的美国的蓝领工人，即技能水平较低的工人，其工资没有太大的上升，但也没有下降，失业率也没有上升。具体说，在 1983 到 1996 年的 10 多年的时间里，蓝领工人的工资水平停滞不前的；随着贸易逆差越来越大，其工资却开始上升。这些皆与模型的判断相反。所以很自然的人们会问，到底是经济模型，比如说赫克歇尔-俄林模型错了，还是数据错了？

2. 技术创新导致工人工资提高、频繁换工作

过去的 20 多年里，全球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济趋势，但并不是唯一重要的趋势的。另一个重大的经济趋势就技术创新速度不断加快。可以观察到，在办公场所，电脑替代了电视、传真、电话等等。

技术创新的影响之一是技术创新使工资水平提高。

由于技术创新的速度加快，同样的投入可以生产出更多的产品，即使面临国外的竞争，仍可以向工人支付更高的工资。赫克歇尔-俄林模型认为经济全球化和竞争会使得工资下降，但由于技术创新会使工资上升，当技术创新促使的工资上升力度，超过了竞争导致的工资下降力度，美国的总体工资水平就会上升。

王海峰认为胡永泰的理论很好解释了随着贸易自由化程度的提高，美国的失业率没有下降同时工资却提高的现象。他也进一步推断，蓝领的收入增加非常有限意味着非蓝领很可能是服务业以及高技术的制造业的收入比以前增长的更快，意味着美国在高端技术、高端服务业方面的边际收益可能非常高。这也表明，美国的技术行业、服务行业受益于全球贸易自由化。

技术创新的影响之二是技术创新导致人们频繁换工作。

胡永泰强调，技术创新提高了产量，但也有负面影响，技术创新使工作技能过时，一些使用旧技能的工作将推原来的工作，即技术创新导致人们可能会频繁换工作。

80 年代以来，美国同一的年龄层保持一份工作的时间的越来越短，证实了这个预测。45 至 54 岁的年龄层，每份工作的时间从 1983 的 12.1 年减至 2005 年的 8 年。其他的年龄层的人也呈现这样的特点。导致人们频繁换工作的原因可能是人们越来越没有耐心做同一份工作，所以想要不断的换工作，也可能因为他们所拥有的技能过时了，所以不得不换工作。

频繁更换工作并非没有代价的，失业者必须要承受很大的心理压力和物质压力。具体而言，失业意味失去公司买的医疗保险，非常危险的。与其他工业化国家对比，美国对失业者提供的救济较少，持续的时间也比较短。在美国，失业保险只能够保证失业者获得上一份工作的工资的 53%，较其它工业国家较低。德国的比例是 78%，法国是 73%，唯一

比美国低的是英国，在撒切尔夫人统治之后比例是 46%。同时，美国提供失业保险的时间也比较短，仅有 6 个月。在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只要能够证明你正在积极找工作，就可以永远享受失业保险，这是一个非常极端的情况。在德国是 12 个月，法国 13 个月，西班牙 24 个月，英国也是 6 个月。

究竟什么导致工人频繁更换工作？有人认为是全球化。胡永泰则认为是技术创新。美国技术创新可以从格林斯潘的自传得到印证。格林斯潘任美联储主席时，曾被人指责频繁使用扩张性货币政策，但他认为他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当意识到劳动生产率提高导致经济中供给增加较快，通过使用扩张性货币政策刺激经济中的需求。其中，劳动生产率提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技术创新。王海峰则给出另一个解释，他认为 80 年代以来美国就业人群换岗周期缩短也反映了随着技术进步、发明创造的增加，美国企业的创立和破产的平均周期缩短，同时工作机会增加，劳动者通过跳槽可以获得更高的薪酬。虽然人们频繁换工作，但由于整个经济发展的速度非常快，所以劳动者总是能够找到新的工作，从新工作得到的报酬可能与之前同样多，有时候甚至更高。

胡永泰指出，全球化和技术变革并非完全独立，有时候二者是互补的，可以并存，技术的创新能促进全球化。比如，以前公司需要聘请会计师去办公室才能完成的帐目整理，现在公司只需要把帐目相关的表格发送到印度，则可收到按照美国会计准则处理处理的帐目。

三、中国经常帐户持续顺差的原因

作为全球化的受益者，中国通过出口产品促进了经济快速增长，但大规模的经常帐户顺差也造成对外贸易争端。1994 年之前，中国经常帐户的余额是变化的，有的年度顺差，有的年度逆差。1994 年之后，经常帐户一直维持顺差，且数额不断上升，尤其在 2004 年之后，增幅更明显。是什么原因导致了 1994 之后持续的经常帐户顺差？在经济学理论中，与经常帐户余额相关的是预算余额（ $T-G$ ）、储蓄-投资（ $S-I$ ）的余额，若存在私营经济，也包括私营部门的储蓄和投资。之所以中国的储蓄持续的大于投资，最终导致出现持续增加的贸易顺差，原因有以下几方面。

1. 国有银行放贷行为的改变

国有银行不良资产导致银行惜贷，导致储蓄大于投资。1994 年之前，银行所有当年储蓄都转为下一年的投资，所以经常帐户余额时正时负。1994 年之后，国有银行不良资产问题困扰中国政府，银行的不良贷款形成银行的不良资产，需要政府注资去挽救银行。因此，政府向银行各级行长施压，严格防止不良贷款，导致银行在提供贷款方面谨慎，有些储蓄不再转化为投资。

国有银行对私营企业歧视，导致投资不足。一般的私有经济中，银行提供大量贷款给私营部门。在中国，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很多贷款是国有企业贷款，私营部门受到银行的贷款歧视。一方面，出于政治敏感的原因，对私营部门的贷款如果由于企业破产等原因不能及时偿还，银行可能涉嫌与私营企业共谋。另一方面，非上市公司的私营企业财务报表不可靠，他们常会少报利润、少交税，导致银行缺乏可靠的依据向其提供贷款。

中国并非第一次出现持续经常帐户盈余的现象。上世纪 60 到 70 年代中期时，中国台湾出现了同样的情况。在 80 年代中期之前，台湾的银行都是从日本接管的银行，所有银行都是国有银行，直到 80 年代，台湾出现了私营银行和外资银行，才结束这种局面。其间，在 1986 年，经常帐户盈余曾高达 GDP 的 21%。

王小鲁研究员赞同胡永泰对 1994 年前后中国国有银行贷款行为改变对中国宏观经济中储蓄持续大于投资的分析。他同时也提出，这些分析也可以从银行存贷款数量变化中得到数字支持。近年来银行贷款与存款比有下降趋势，表明存款增速很快，但贷款增速相对存款较慢。银行的储蓄存款不能转化为投资，有剩余的储蓄存款，从而商业银行受中央银行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的影响不大。

2. 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国企不分红导致储蓄大于投资

除了胡永泰谈的银行方面的原因，王小鲁结合自己多年对收入分配等问题的研究，谈了其他导致中国储蓄过高的因素。

近年来，中国居民消费占 GDP 的比重持续下降，从改革初期时的 50% 多，降到 2006 年的 38%，2000 年左右以来，下降速度更快，且仍在不断下降。最终消费占 GDP 的比重降幅也很大，从改革初期的 60% 左右降至 2006 年的 50%。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信息，消费在 GDP 中间的比重不断下降，导致储蓄不断上升。

王小鲁认为，高储蓄必然导致储蓄大于投资。若储蓄用于投资则形成生产能力，若内需不足，无法吸收该生产能力则就形成过剩生产能力，造成投资过剩。投资过剩会导致各行业平均利润率下降，经济效益减少，从而限制投资者进一步投资。即使投资者有资金或能够从银行贷款，由于利润率低，无法进行投资。从数据来看，尽管投资增长率是两位数，高达 20% 多，但仍落后于储蓄的增长。投资增长落后于储蓄增长的实质是，内需不足形成过剩生产力及出口压力，造成净出口不断上升。

王小鲁分析近年来消费持续下降、储蓄持续上升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方面是收入差距扩大导致居民储蓄增长；另一方面是因为国有企业不用向国家分红，造成了企业储蓄的增长。

第一，企业储蓄上升。国有企业的股东是国家，国家允许国有企业在完税后利润，不向国家分红。比如油价上涨带动石油公司利润翻番，而额外的利润除了交税以外，并不需要向国家分红。因此导致国有企业存有大量资金，造成了企业储蓄的迅速增长。

第二，居民储蓄上升。有统计数字表明，随着收入分配的差距不断扩大，高收入居民的收入增长速度远远快于低收入居民的收入增长。与此同时，高收入居民的储蓄率远远高于低收入居民，因此当收入分配更多的向高收入居民倾斜的时候，会导致储蓄上升。

王小鲁认为，由于社会保障体制不健全，医疗、教育成本费用高昂，中低收入居民为了保证将来有钱看病，有钱送孩子上学，有钱买房等原因，减少消费，提高储蓄。尽管中、低收入居民的储蓄率较低的，但是相对于过去，其储蓄率仍是上升的。

王海峰同意王小鲁这个观点。他认为，中国多年的社会福利改革或者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是滞后的。胡永泰谈到美国的失业保险大概是工资的 53%，为期 6 个月，但是在中国，失业后可后能只能领几百块钱，其保障作用太小。义务教育方面，虽然政府免费提供九年义务教育，但公民上学仍有较高的潜在成本，需要政府进一步提供大量的资金。

尽管存在种种原因导致中国国内结构不平衡、储蓄率过高，但是王小鲁认为这种情况最近一两年有所改善。从 2006 年的数字来看，多年来第一次低收入居民的收入增长不再低于高收入居民的增长。2006 年，城市最低收入居民和最高收入居民，收入增长都是 10%，农村最低收入居民的收入增长率比高收入居民还高了一个百分点，是 11%。

2006 年以来低收入居民收入增长是由于近一两年在社会保障方面的改善。农村方面，前几年政府取消了农业税；2006 年开始，农民的孩子上学不用交学费；政府大幅度推广农村低保；农村实行了经营合作医疗制。城市方面，城市低保的覆盖范围也扩大了，几种社会保障的覆盖率都在上升。预计 2007 年，低收入居民收入增长幅度会更大。这将有助于减少储蓄率的进一步提高，同时也可能鼓励居民消费。

3. 中国的贸易模式决定了贸易顺差的持续存在

庄健认为中国处在国际产业分工链条的末端，反映了劳动力成本比较低的比较优势，导致加工贸易尤其是来料加工比较多，大多数进口的目的是为了出口。目前，这种加工贸易占总贸易的一半以上，只要现状持续，必然存在贸易顺差。

四、中美共同努力减少贸易不平衡，促进世界自由贸易

1. 中美贸易不平衡，双方都需要调整

很多美国人认为，人民币升值可以缓解两国间贸易摩擦和紧张的情况。胡永泰认为，即使实现了人民币的升值，也不能够消除两国间紧张的局面，这并非最好的做

法。设想人民币马上实现 25% 的升值，只要亚洲其他货币汇率不变，美国虽然减少从中国进口产品，但会从越南、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泰国等国进口，从而即使中美之间的贸易顺差会下降，但是美国要从其他东亚国家购买商品，美国整体贸易逆差状况却不会发生改变。

胡永泰认为只要整体贸易逆差保持不变，只要技术创新持续下去，中美两国在贸易方面的这种紧张的局势就会存在下去。除非所有亚洲国家的货币都升值，否则人民币的升值并不能够抵消美国技术创新对美国国内就业的影响，也不能够减少美国总的贸易逆差。王小鲁非常同意胡永泰的观点，认为中美贸易逆差更多的来自经济结构方面的问题，而不能单纯的把它看成是汇率原因造成的。

胡永泰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并不是靠一个国家单独采取行动就能解决的，也不是只靠使用一种工具即汇率调整就能解决，它需要很多国家共同采取行动，而且需要采取多种工具。面对中美贸易争端，胡永泰认为大家需要关心的是中美两国应该共同做些什么，而不是单个国家该做什么。王小鲁认为，从经济结构来看，美两方面都存在消费和储蓄之间结构的不平衡。中国持续贸易顺差与中国国内储蓄率太高、消费率太低有关；而美国持续逆差，则与美国的储蓄率太低、消费率太高等美国自身方面的问题有关。

2. 中国减少经常帐户顺差的措施

即使中国的经常帐户盈余为零，由于美国的技术创新是导致工人焦虑状况的内在原因，中美两国间可能仍存在紧张关系和矛盾。但维持经常帐户盈余为零能使美国无法将紧张关系照归咎于中国。中国可通过以下几种试为减少经常帐户顺差。

第一，通过市场化改革减少无效投资。王海峰认为，1992 年市场化改革以后，虽然经过半年到一年的短暂滞后，市场改革最终提高了经济效率和市场效率。之前，以国有企业为主导的投资，效率较低，生产的产品无法满足消费者的需要。经过市场化改革，由于坏账问题，银行开始惜贷，减少了无效率投资，总投资减少。不是所有的储蓄都能转化为投资。1992 年以后，外资银行进入国内，挤出一部分对内资的投资，特别是对国有企业的投资，对乡镇企业的投资也会挤出对国有企业投资，更有效率的投资替代了无效投资，也导致总投资减少。

第二，中国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胡永泰认为，中国应该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将高储蓄转化为投资。可以在增加国内财政支出，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减税等。其中，基础设施建设只是一个短期的方法，但全世界的经验都证明了长期它会引发腐败。另外可以增加进口密集型的投资。在美国绝大多数的留学生都是靠美国大学提供奖学金，中国政府也可使用外汇储备公派中国学生去国外学习。

第三，进行银行业改革。胡永泰还认为，解决中国经常帐户盈余问题根本出路在于解决中国金融体制问题。一个非常高效的银行体系可以使所有的储蓄都转化为投资，这样的话，就可以降低经常账户的盈余。

他认为，改善中国的银行体系能够有效解决储蓄过剩。中国银行业现主要由国有银行或国家控股的银行主导，而政府允许外资私营银行一定程度的进入，但不太鼓励国内私营银行的发展，这种情况不常见。中国需要建立起私营的银行，也需要不歧视私营企业的银行，并改变银行业为国有成分银行主导的局面，使银行贷款不止提供给国有企业，也可以提供给私营企业，从而所有储蓄才能转化为投资，扭转经常帐户持续盈余的状况，维持经常帐户正常。

五、国外学者对中国未来的展望

胡永泰提到，外国的学术界在研究中国的时候，总是不同的时间有不同的观点倾向。早些年，对于中国的未来常常较悲观。甚至有人预测中国在某些方面会崩溃，以此来建立起自己的声望，显示的才智。若崩溃发生，则证明预测者有先见之明；即使没有发生崩溃的话，也说明正是预测者的警告才防止了崩溃发生。

近来人们则倾向于对于中国的未来非常乐观。比如，2005年中国是美国GDP的1/6，根据高盛的预测，基于2005年购买力平价，到2040年中国就会赶上美国，到2050年的时候，中国的经济规模将会比美国大25%。

把中国比做快速行驶的汽车，一路上不断赶超其他车辆。人们难免会有疑问：这么快的车，会不会撞车呢？如果翻车或者撞车，导致事故的原因是什么？

借用信息时代的术语，可以把事故的原因大致分为三类，一类是硬件故障，一类是软件故障，还有一类就是就是能量供应故障。

硬件出故障包括轮胎爆气、或轮胎松弛、或发动机故障。这相当于经济学家们常提到的银行失灵带来的危机，包括国有企业生产率低下、公共财政管理低效等问题。

软件出故障则是指，比如说车里的乘客在某方面意见不一而发生冲突，比如对车行驶方向、驾驶方式等意见不同。这对应于行政管绩效相对于人们的期望值变低，这意味着并不一定是行政管理业绩真正的下降，而有可能是因为人们的期望值提高。在中国社会，人民通过教育等方式不断了解外部世界，在对比中，他们期望政府能够改进行政管理，最终在改善人民生活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能源供应故障则是指汽车缺油、缺电，或者别人拨走汽车钥匙导致无法启动车辆。汽车没油，相当于环境方面的灾难，那么对中国而言，可能指缺水或是气候变化导致的问题。别人拨走钥匙，则意味着其他的国家对中国的贸易制裁。

以上三种故障出现的机会并不相同。在硬件方面，世界上其它国家的经验说明了绝大多数硬件问题可以有效解决，中国政府也有信心根据自己的国情通过改造其它国家的解决方案来解决硬件问题。即使新创造的解决方案可能会出现错误，只要有一定的学习能力，中国政府不可能持续犯错。在软件方面，中国提出了创建和谐社会，充分表明中国解决软件问题的决心，同时中国也不断出台各种建议方案、方法，如减轻农村贫困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软件故障。而能源供应故障在未来几年内可能涉及到中国对外贸易遭到严重的破坏。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人们对于贸易能够改善人们福利所作出的贡献感到很失望。

胡永泰认为应当提醒大家，在看到中国飞速发展的同时也应该关注印度的快速发展。全世界不止看到一个巨人、一个大国的归来，而是看到了两个大国的兴起。

(本文由谭淞、马静编辑整理，肖华、李金迎、饶松松审校)